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 (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 2 卷第 4 期  
(总第 5 期)  
2004 年 12 月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闫凤桥；

本期执行主编：岳昌君

##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文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 一、 起源

高等教育财政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高等教育财政研究是运用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的财政问题,集中于货币化的教育投入即高等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和使用,着重于政策实际。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教育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家、墨家、法家等纷纷开办私学。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上学要交学费的思想。<sup>1</sup>

靳希斌主编的《从滞后到超前》<sup>2</sup>一书,向人们揭示了20世纪教育财政研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开端,并介绍了代表当时中国教育财政研究两本著作。邵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对中国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邵爽秋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广开教育经费筹措途径、统一教育经费行政等思想,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个办法,包括确定教育基金、划分教育税源、预算制度独立、加税权力独立、征收机关独立、保管机关独立、用款权力独立和审核机关独立。

## 二、 基本理论

高等教育财政研究高等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和使用,这就涉及到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和分担机制,特别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在高等教育财政中的作用。教育财政的理论依据往往源自公共产品理论。高等教育的产品性质也往往存在争议。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社会总产品可以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三个特征。高等教育显然不具备纯粹公共产品的特征。17%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意味着它是拥挤的,竞争的和排他的。但高等教育带来的效用和收益却不能完全实现分割。高等教育不光使受教育者直接受益,而且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高等

<sup>1</sup>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13-26。

<sup>2</sup> 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13-328。

教育的社会收益对于每个受教育者而言是不可分的。因为这一特点，高等教育应是准公共产品。但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是一种正的外部效应，因此高等教育是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私人产品。另一种中庸的观点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教育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这两个极点之间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义务教育等更偏向于“公共产品”一端，而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则更具有“私人产品”的色彩。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可以看作是游离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更偏向于私人产品一端的产品形态；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和不同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私人产品端点的距离有不同。

### 三、 核心概念

效率、公平和充足是教育经济学的三个核心概念，也是教育经济和财政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效率用来评价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最小的资源投入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或给定的资源投入是否获得了最大的效益。对高等教育的效率进行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在于其产出计量的复杂性，而且在于其投入和产出的多样性。高等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知识生产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是一个多类型投入和产出的机构。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活动，三项活动均有不同的产出。一个系统的效率有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之分。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可以用来衡量多类型生产机构的资源投入和产出，指的是最小成本的合理配置达到最大的产出。高等教育的生产效率常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内部效率(internal efficiency)和外部效率(external efficiency)。内部效率指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或学校方面的投入与直接产出(output)之比。外部效率指高等教育的间接产出(outcome)与教育投入的比较，衡量的是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满足情况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高等教育投入包括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投入、学校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投入等。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活动而言，直接产出指培养的学生数量和质量。间接产出指学生在离开学校后的就业状况，以及在进入到社会各个部门后对提高生产率，增加国民收入和个人收益所起的作用。在评价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时，投入指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或学校方面投入的人力和资本，一般可以有人、财、物三种形式。在评价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时，则要区分不同情况考虑不同来源的投入，如估算

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时投入度量的是私人成本;估算社会收益率时,投入度量的是社会总成本。比如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属于内部效率范畴,收益率则是外部效率的概念。

效率的计量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公平的测度则是主观的、有价值取向的。公平指投入和产出分布的公正和均等。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代际公平(Psacharopoulos and Woodhall, 1985)。横向公平指对相同社会群体以平等对待,如给予相同学习能力的人以相同的教育机会;纵向公平指对不同社会群体以不同对待,如给予贫困学生以助学金和补贴性质的贷款,给予优秀学生以奖学金,给予残疾儿童以特殊教育等;代际公平指不公平不在代际间传递。以经济学的视角,高等教育公平包括公共教育资源、受教育机会、教育效果和收益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分配的公平性。近年来,关于公平的研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财政研究的一个热点。

财政充足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由于投入和产出的多样性及其对质量的追求,高等教育不可能成为古典经济理论对一般经济产业描述的那样是追求“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的生产部门,相反,为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在控制了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呈递增的趋势。<sup>3</sup>“充足”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sup>4</sup>。财政充足与教育效果有紧密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效果在教学和科研上的两个最基本的体现一是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的满足情况,二是科研成果对人类知识的进步、科技进步和变革所起的作用。为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特定水平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必须得到保障。在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紧缩的情况下,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通过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努力弥补高等教育经费的不足,这包括高等教育受益者个人及其父母补偿部分教育费用、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赠、通过竞争机制获得的科研经费和来自金融资本市场的投入等。对高等教育财政需求的度量通常涉及到高等教育的预算过程和成本分析。

<sup>3</sup> 丁小浩,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与成本补偿,《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

<sup>4</sup> 在美国义务教育中,财政充足的法律概念是指州公立中小学财政拨款体系要为州内普通公立学校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以使每个普通中小学生能够达到州规定的的成绩标准;同时,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如残疾儿童、天才儿童)提供额外需要的教育资源,以使之能够达到州规定的特殊学生学业成绩标准和天才儿童的学习要求。对充足的度量从其法律概念出发,方法有统计法、实验法和成本研究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充足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成为衡量美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是否违宪的最有力砝码(李文利等,2002)。而高等教育由于产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没有一个明确且严格的“充足”的定义。

#### 四、 主要研究成果

##### (1)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sup>5</sup>

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在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对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使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三级教育规模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相适应,应加大各级教育投资的力度,尽快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轨。

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政府应该达到的教育投资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积极地推动了增加教育投资的国家宏观决策。以此为依据,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了到 20 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 4%的政策目标,并规定了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原则。

##### (2)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措<sup>6</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各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下降,高等教育经费出现了全球性的财政紧缩。与各国三级教育注册生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不相适应的是,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985-94 年间稳定在 5%左右。而中国的情况更是不同乐观,在整个 90 年代,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点几,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相对减少,家庭和企业所占的份额相对增大。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由单一渠道转向多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用于教育的费用、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赠、教育基金、科研经费等。

对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的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结构的

<sup>5</sup>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典型研究见厉以宁主编,陈良焜、孟明义、王善迈副主编《教育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秦宛顺主编、厉以宁副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一章、第四章。岳昌君、丁小浩,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2003/5。

<sup>6</sup> 主要研究见陈良焜《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分析》(《教育研究》1994 年第 4 期);陈昭方《中国大学教育资金的多元化及未来发展》;胡瑞文、陈国良《中国高教筹资多元化:成就、挑战、展望》;王新《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多样化的战略规划》;李文利《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分析》(教育部和 OECD 主办“高等教育发展和财政政策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4 年 7 月)等。

总趋势表现为: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仍是高等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正在逐年下降。与此同时,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越来越大。在非财政性经费来源中,事业收入是主要渠道。进一步的分析发现,1997年普通高校收费的并轨确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高等教育经费面临的危机,同时也铸成了多元化经费来源的基本格局。

### (3) 关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sup>7</sup>

在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渠道中,受益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成为非财政性渠道中的重要途径。由受益者本人或其家庭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来补偿高等教育过程中发生的成本的形式,称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即时付费是学生家长分担成本的贡献形式。学生贷款是学生本人补偿成本的形式。对人口年龄结构构成变化、居民家庭收入变化、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以及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公平性效果等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在教育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 (4)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需求<sup>8</sup>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教育经费依然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那么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压力有多大?有研究曾经对教育(含高等教育)经费进行了需求预测,常用的办法是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各级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用以乘以相应的学生数。由于各级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和学生数本身的不稳定性,这样估算出来的经费需求额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 (5) 关于高等教育成本<sup>9</sup>

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析可基于不同水平和类型,包括社会成本、机构成本和

<sup>7</sup> 主要研究见陈良焜《论家庭教育支出》(《教育与经济》1993年第1期);蒋鸣和《关于高校学生收费标准的分析》(1994);陈良焜《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个人(家庭)成本补偿的必然性》(《教育研究》1996年第8期);钟宇平等《成本回收: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另类选择》(《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12期);闵维方《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高等教育》人大复印资料1995/5);陈晓宇《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陆根书等《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邓娅《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孙也刚《论研究生教育成本补偿》等。

<sup>8</sup> 主要研究见闵维方等《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投资体制改革》(《教育研究》1994年第12期);陈晓宇、陈良焜《九五末期与2010年中国教育经费供求前景分析》(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第七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课题组《2002-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需求分析》(《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407-411页)。

<sup>9</sup> 主要研究见袁连生《教育成本计量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韩宗礼《试析我国大学生的教育成本》(1988);陈淑梅《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成本的个案分析》(硕士论文2003);崔邦焱《高等学校成本计量分析》(博士论文2003)等。

个人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物质成本和人员成本等等。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基于学校水平的成本研究。对高等学校的成本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估算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需求，而且可以为成本补偿政策提供生均培养成本的数据参考。但我国高等学校的会计帐户基本上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进行核算的，学校通常按业务发生的时间顺序做收支记录，与权责发生制核算成本的方法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研究一般是从会计科目入手，尽可能地将经费支出转换成权责发生制下的成本支出进行核算。

#### (6) 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和内部效率<sup>10</sup>

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浪费也是非常重要的。1978-1989年我国的高等学校校数的增长率略低于高校在校生数的增长率，而高等学校的校均在校生规模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年增长率。这种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使得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低下。1988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均规模约1922名在校生，平均生师比为5.25:1。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把生师比提高到10:1，在平均学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生均经常性经费支出可以下降24%。如果平均学生规模提高到4000名在校生，生师比提高到10:1，每个学生平均每年的经常性开支可以缩减418元。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4000名在校生的校均规模是一个比较接近当时条件下的高等学校的适度规模。据此，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应采取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依据规模效益的理论进行高等学校结构调整的办学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和结论都有力地影响了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小规模院校合并、办学结构调整等政策的制定。

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关注的是以学生数衡量的教学投入和教学产出的比较。高校是多投入多产出的机构，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体现在科研投入及其产出上。对高等学校范围经济的研究对比了单投入单产出和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差异。

另外，一些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对高等学校的相对效率进行比较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 (7)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体制和模式<sup>11</sup>

<sup>10</sup> 这一阶段的典型研究如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1990)、丁小浩《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再分析》(1993)、闵维方等《高等院校系和专业的规模效益研究》(1995);秦宛顺主编、厉以宁副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章;厉以宁主编《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六章、第七章;刘亚荣《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效率研究》(《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536-545页,2003);侯龙龙《中国高等教育范围经济研究》(博士论文2004);等。

在对教育投资的内部效率进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们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投入低、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较低的现象,于是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成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又一方法和途径。在这一阶段,教育经济学者们对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在学校之间的分配、在学校内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以成本行为为基础的多政策参数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以透明、公正、有效为基本原则,以高等教育事业费中的政府拨款为对象,吸取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的有益经验,重新建构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结构,提供了一种在高等学校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科学模式。

鉴于公平、公正、有效、透明的拨款方式必须有相应的拨款体制为依托,一些研究考察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基金制的设想。<sup>12</sup> 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可以逐步改变高等学校的附属地位,使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由对高等教育条块分割式的直接管理逐步改变为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拨款充分体现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原则;可以确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一些研究建议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sup>13</sup>。教育经费预算单列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确保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使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与政府的投入更为协调,更好地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也有利于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和实行。这一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得到体现,其法律条文阐述如下:“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

#### (8) 关于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和学生贷款<sup>14</sup>

<sup>11</sup> 关于高等教育拨款体制和模式的研究包括:邵金荣《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之我见》(1989)、王善迈等《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1991)、魏新等《关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的研究》(1994)、闵维方等《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投资体制改革》(1994)、官风华等《高等教育拨款模式研究》(1995)、陈国良《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研究》(1996)、李文利等《中外高等教育拨款方式比较与中国高等学校拨款制度改革趋势》(1997);厉以宁主编《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八章等。

<sup>12</sup> 魏新等:《关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的研究》[J],载《高等教育研究》1994,(4):38-45。

<sup>13</sup> 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96-300。

<sup>14</sup> 主要研究见赵中建《高等学校学生贷款》(1996);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1997);褚保堂《学生贷款中的“逆向选择”与制度创新》(1998);李文利等《论学生资助对高等教育入

高等教育直接拨款机制是政府直接将高等教育经费（或通过一个缓冲机构）拨付给高等学校；间接拨款机制是政府将经费以学生资助的形式支付给学生，学生再付学费给学校。学生资助作为一种间接的经费供给机制，对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效率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从效率的角度看，受教育机会应该优先考虑具备较高能力的人，因为能力高的人通过受教育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如果收入和能力是不相关的话，那么根据付费能力确定入学机会的做法则是非常不效率的。为保证教育效率，制定入学标准以确保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是适龄人口中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个人成本较高，仅仅通过制定入学标准有可能把一些没有付费能力但具有学习能力的求学者拒之门外。辅之以奖助学金制度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种保证入学机会的公平和效率的方法是启动教育资源市场，即实行学生教育贷款制度。学生贷款实际上是使学生预支其未来收入用于当前的教育投资。因此，如果教育收益高的话，学生贷款的实施可以进一步增加个人教育资源的流量。同时，由于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不再受家庭付费能力的约束，教育系统对学生的选择将依赖于其学习能力，这样会使得教育更有效率。

学生贷款、奖学金和助学金是政府和各类机构对学生提供财政支持的主要方式。什么是向学生提供资助的最好形式，以及资助的效果，学生贷款的运行和管理机制、资金来源、利率、偿付和拖欠等问题是学生资助和贷款研究关注的热点。

#### （9）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sup>15</sup>

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之后，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为接受高等教育负担了一部分成本，学费无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继而增大了机构提供教育供给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对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而言，学费和学生资助作为一类重要的财政因素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来预期收益一起成为了影响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经济特征。

研究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收学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学费已逐渐成为人们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对学费的反应随

---

学机会的影响》（《北大教育评论》2003/3）；Shen, Hong and Li, Wenli (2003). The Student Loans Scheme in China, UNESCO & IIEP；李文利《国家助学贷款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2004/2）；李文利《高校学生贷款运行模式的中外比较和政策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04/4）；等。

<sup>15</sup> 主要研究见田苏菲《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与教育公平》（1996）；李文利《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江苏高教》2001/3）；李文利《中国居民高等教育需求研究》（博士论文2000）；哈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与学生资助》（硕士论文2002）；李文利《助学贷款对入学机会公平的促进及可持续发展》（《中国高等教育》2003/9）；丁小浩《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1990年代的变化及分析》（国际会议论文2003）；李文利《付费能力、信贷约束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国际研讨会论文2004）。

着学费水平的提高表现出差异。这些研究结论为向弱势群体提供教育资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维持教育机会的公平,使得每一位有资格的求学者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亦成为必然。

## 五、 未来展望

### (1) 理论发展

多年来,教育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一直有赖于公共产品理论。政府的职能、私人对成本的分担、社会其他机构的作用多围绕公共产品理论进行分析论证。近年来,第三部门理论悄然出现,教育机构具有典型的第三部门特征,如正规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但有些特征仍不是十分符合,如民间性。我国的公办高校在组织管理上不是民间组织,管理机制上未与政府分离。而民办高校又不完全符合非营利性的特征。尽管如此,第三部门理论仍然可以作为分析高等教育财政中各方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依据,以进一步探讨各级政府、个人和社会其他方面在经费分担机制中的相互关系。

### (2) 多渠道的经费来源

高等教育财政已然形成了多渠道的投资体制。政府拨款所占比例虽然在逐年下降,但依然是公办高校经费来源中最主要的渠道。政府拨款在高等教育财政中的位置自然倍受研究者的关注。在公共财政体系中建立一个有序的、规范的、稳定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系依然是高等教育财政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中,科研合同收入、非学历教育收入和社会捐赠逐渐取代校办产业在高校经费来源中的位置,成为具有上升趋势的经费来源渠道。之前,高等教育财政研究多集中在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两方面;今后,科研合同收入、非学历教育收入和社会捐赠将成为高等教育财政研究关注的问题。

### (3) 对于学费水平和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

在我国已经普遍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今天,人们对高等学校的学费也越来越关注。特别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财政经费的紧缩,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成为经费筹措的一个重要的非财政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提供有效的学生资助措施是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者责无旁贷。

#### (4) 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进一步研究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学费水平的变化和各类资助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的公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高等教育财政公平性的内涵包括机会公平、资源分配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学费和学生资助的配合可以改善高等教育的公平。国际上关于学费对于入学机会公平性的影响有一致性的结论，但学生资助对入学机会的影响尚存在争论。另外，不同的资助形式对于教育结果的影响也会不同。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仍将是一个热点问题。

#### (5) 私营化浪潮下的高等教育财政

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正在面临着私营化的浪潮，为了满足教育扩张过程中人们对教育的超额需求和差异需求，私立高校和各类营利性的培训机构大量出现。教育私营化一方面有效地实现了教育规模的扩张，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多种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促进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了人们的受教育机会。高等教育中的私营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教育财政研究关注的问题。

#### (6) 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财政

虽然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私营化的浪潮，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在高等教育财政中的责任和义务。研究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肩负着知识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科研经费的有效供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作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研究的综述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敬请与会者批评指正。)

#### 参考文献：

Stephens M. 1992. Econo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Burton R. Clark and Guy Neave. *The 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 Pergamon Press Ltd. 896-906.

陈学飞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年。

丁小浩著，《高等学校规模效益的实证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

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厉以宁主编,《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李文利、曾满超,美国基础教育“新”财政,《教育研究》2002年第5期。
- 李文利,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及重要成果,《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
- 李子彪等编著,《教育财政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孟明义主编,《高等教育经济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 闵维方主编,《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闵维方等主编,《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 秦宛顺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修订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 王善迈著,《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魏新主编,《教育财政学简明教程》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